

天津出版史料

第一辑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天津出版史料

第一辑

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出版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
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研究会
《天津书讯》编辑部

主 编

孙五川 林 呐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天津出版史料（第一辑）

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出版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

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研究会

《天津书讯》编辑部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）

天津富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印张6 1/8插页2字数150,000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000

ISBN7-5306-0272-1/k·1 定价 3.15元

前 言

《天津出版史料》(第一辑)就要出版了。

天津出版史料征集工作是从1986年开始的。最初由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研究会主持其事。从1986年4月着手组织第一批文章(几个老出版社的简史),到1987年初基本完成,同年上半年,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,进行补充修正。下半年,组织第二批文章(即本辑中的专题文章),1988年初完成,亦随之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。1988年下半年,根据新闻出版署有关指示,市新闻出版管理局成立出版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筹备组(领导小组已于1989年3月正式成立),随后拟订了第三批选题。与此同时,决定将第一、二批史料文稿加以整理,交《天津书讯》编辑部负责组织出版。

编入本集中的文章,绝大部分是天津的老出版工作者撰写的。杨大辛、李克明、董延梅、诸有莹、傅履初、刘学淑、张道梁等同志,都是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初的老出版工作者;吴云心同志是新闻战线的老前辈。为了搜集资料撰写出版史料,他们不顾年老体弱,甚至带病工作;为了订正一个史实,核实一个数字,他们不惜奔波劳碌,直到满意为止。出版战线许多老同志,亦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,为之提供资料,核实情况。文章中的每一条史实,每一个数字,都凝结着撰稿人和其他老出版工作者的汗水和心血!当此书出版之际,我们谨向为它付出艰苦劳动的所有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!

由于过去档案制度不够健全,加上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破坏,给撰写史料文章带来很多困难。许多问题因为缺乏文字材料需要

依靠当事人回忆；由于年深日久，人们的记忆难免存在差异，虽经反复核对，终因种种条件所限，难于一一征询，脱漏或舛误之处在所难免。现在将这本史料编辑出版，除了为研究天津出版史志积累必要的资料以外，恳切希望熟悉情况的同志提出补充修改意见，以便进一步加以订正。

《天津出版史料》将不定期编辑出版，希望大家踊跃赐稿和提供有关资料。

编者1989.6

目 录

天津近代出版事业的回顾……………杨大辛 (1)

从部分出版物看二十至五十年代

天津出版业的侧面……………吴云心 (15)

读者书店——知识书店简史 (初稿) (1949.1—1952.8)

……………刘学淑 (26)

天津通俗出版社简史 (初稿) (1952.9—1956.3)

……………傅履初 (39)

天津人民出版社简史 (初稿) (1956.3—1966“文革”前)

……………傅履初 (53)

百花文艺出版社 (1958—1966)

工作回顾……………董延梅 李 申 (70)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社史 (初稿) ……张道梁 (94)

〔附录〕天津人民出版社大事记 (1979—1987)

……………李春香 (109)

百花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出版情况简述

……………李克明 (128)

在散文园地上的耕耘……………董延梅 (138)

天津“人美”年画翻身记……………张道梁 (145)

二十九年历程 (1949—1978天津少儿读物出版简况)

……………诸有莹 (155)

博采海外名篇 介绍寰宇人杰——丛书《外国名人传记》

走向系列化……………李 桅 (167)

部分出版物情况表 (1949—1978) …… (172)

天津近代出版事业的回顾

杨大辛

近代的天津，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，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，造成了长期的政治动乱局面，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梗阻，文化教育备受摧残。具体到出版事业，时起时衰，发展缓滞，其状况与天津这样一个北方大工商业城市的地位，很不相称。

一

天津早期的聚落，始见于《金史》的记载，称为直沽寨，时在公元十三世纪初。元代延祐三年（1316年），改直沽为海津镇，当时漕运已相当发达，遂形成南北水陆运输的枢纽。明代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，成祖朱棣令在直沽设卫，并命名天津，构筑城池，成为拱卫首都北京的军事重镇。其后经过二三百年的演变，人口增繁，舟车畅达，物产丰盛，商业隆兴，天津成为我国北方一个繁盛的封建都会，同时也是南北物资集散中心和贸易口岸。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，文化事业也相应地有所发展。

天津的出版事业始于何时，史无记载，但肯定不可能发生在设卫之前。明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，天津左卫指挥朱胜在东门里捐建文庙，开办卫学，是天津兴办教育之始；其后随建制的变化，改称州学、府学，又有县学、屯学、运学、义塾、私塾以及书院等不同档次的学校先后设立，从而促进书坊业的兴起。据史籍记载，天津最早的志书《天津三卫志》，刊行于明正德十四年

(1519年)，又于万历十八年(1590年)续修(明代的这两部志书惜已失传)；到了清代，修志工作达到极盛时期，康熙、乾隆年间陆续纂修的天津卫志、府志、县志以及长芦盐法志等多种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天津官方刻书的规模和水平。清雍正、乾隆以来的今公私多有收藏，不难见到；又据《续天津县志》记载，迄清同治九年(1870年)，历代天津乡人著述书目有195种之多。这些情况表明，天津早期的出版事业，至迟在十七世纪中叶即明末清初之际，已初具规模了。如果把驰名遐迩的杨柳青年画也纳入出版序列，那么天津出版事业的发端还应再上溯一百多年。

杨柳青位于天津城西三十里，金代称柳口镇，初为驿站，由于地处南运河畔，在漕运发达之后，逐渐形成具备码头条件的村镇。杨柳青年画始于何时，未见确凿的文字记载，相传大抵在明嘉靖年间(十六世纪上半期)。到了明崇祯年间(十七世纪中叶)杨柳青镇已形成辐射北方城乡的年画发行中心了(见《中国版画史略》，郭味渠，朝花美术出版社)。清雍正、乾隆年间(即进入十八世纪以后)，杨柳青年画达到鼎盛时期，全镇有大小画铺近百家。后来年画的生产也不仅限于杨柳青镇一地，其周围二十多个村镇都从事于年画的制作。杨柳青年画从绘图、雕版、印刷以至发行等各个环节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，在天津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。

二

1856—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以后，天津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，西方资本主义——帝国主义国家从政治上、经济上逐步加强了对天津的控制，同时也没有放松文化渗透活动。侵略者通过宣扬西方文明，企图淡化中国人的民族意识，笼络知识分子，培植能为他们所用的“人才”；而在客观效果上，却促进了

中西方文化的交流。在这方面，一马当先的是外国传教士。他们除了在中国积极从事传教活动外，还特别注重办学校、医院与文字宣传；我国近代的出版事业，实发轫于外国教会之译印《圣经》与其他宗教宣传品；以及介绍有关历史、数学、天文、理化等新知识的读物。1869年天主教会在上海设立土山湾印书馆，1887年基督教会在上海设立广学会，这两个教会出版机构的大批出版物，曾经源源不断地流入天津。西学东渐，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文化、新知识的渴求，清政府洋务派也提出“师夷之长技”的主张，于是废科举，设学堂，译西书，建立军事工业，推行所谓新政。天津是洋务派在北方的活动基地，先后在这里开办了一系列新学堂，如水雷学堂、电报学堂、北洋水师学堂、武备学堂、医学堂、巡警学堂、法政学堂，以及中国第一所理工科高等学府北洋大学堂。这些新学堂所使用的教科书，除上海、北京等地编译出版的以外，也根据自身的需要从事于编译工作。如严复所编《英文汉诂》一书，就是他在北洋水师学堂讲授英语语法的讲义，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。这一时期，天津机器局、北洋武备研究所、北洋陆军编译局、天津丙午社等机构，都从事过西书的编译出版工作。1900年以后，天津兴学之风盛炽一时，新式中、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，更促进了教科书的编纂工作。

传播西方文化思潮最得力的工具当推报纸了。中国早期的报纸，和杂志并没有严格的区别，有的虽名为报纸而实际上却以刊载论著为主。天津的第一家报纸是英文的，即1886年11月由天津海关税务司、英籍德人德璀琳创办的《中国时报》，同时出版中文版《时报》，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一度担任主笔。该报馆从国外购进了新式印刷机器，后来这些设备出兑，改组为天津印字馆，成为天津早期技术先进设备完善的印刷厂。其后，又有曾担任北洋武备学堂教官的德国人汉纳根于1895年创办《直报》，日

本人西村博于1899年创办《咸报》。外国人办中文报纸，显而易见是为了把持舆论阵地，扩大西方影响。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报纸是严复、王修直、夏曾佑主编的《国闻报》，创刊于1897年，同时另出一种《国闻汇报》旬刊。《国闻报》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为主旨，在戊戌变法期间曾发挥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。《国闻报》存在的时间虽仅仅一年，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却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就是发表了严复的译著《天演论》，并出版了单行本。严复通过介绍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，鼓吹中国应遵行进化规律变法维新，“自强保种”否则就要沦为“亡国灭种”，为历史所淘汰。《天演论》发表以后，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，唤起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斗志。严复还创立了译书的“信、雅、达”三条标准，为我国的翻译工作规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准则。严复在天津任职二十年，他从事的译著出版活动，为天津的出版事业增添了光彩。

三

1900年，八国联军入侵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之后，天津的知识界处于激烈动荡中，革命的、保守的、改良的各种思潮纷纷涌现，官方和私人都积极办报，如《北洋官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商报》、《中外实报》、《竹园白话报》、《民兴报》、《北方日报》等，在社会上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。资产阶级立宪派温世霖于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创办的《醒俗画报》，以经常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而令人瞩目。

清政府的腐败误国，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，革命党人鼓吹民主革命，策划武装起义，推翻封建王朝。天津距北京咫尺之间，反动统治者对革命防范极严，革命宣传活动难以开展，远远不及南方各地。天津最早出现的革命派报刊《克复学报》，于1911年创刊不久就被迫停刊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，京津同盟会

出版了《民意报》，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，曾受到孙中山的赞扬。其后，各政党及地方知名人士纷纷创办报纸，比较有影响的如《民国报》、《国风日报》、《新天津报》、《大中华日报》、《公民日报》、《新春秋报》、《白话晚报》、《白话晨报》、《天津午报》、《益世报》等。辛亥革命前后，天津出版的期刊也比较多，如中国地学会的《地学杂志》，共和党——进步党的《庸言》半月刊，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的《直隶实业杂志》，社会教育办事处的《社会教育星期刊》，直隶省警察厅的《天津警察杂志》，北洋大学的《北洋大学校季刊》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《言治》，南开学校的《校风》、《南开星期报》，河北商学会的《商学杂志》，国货售品所的《售品所半月报》等等。

天津的近代出版事业起步不算晚，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出版社团与投资，因而始终未能如上海那样形成具有实力的专业出版机构。图书期刊的出版工作，大多由报馆、学校及机关团体兼办。如北洋官报局当时是印刷设备比较完善的报馆，曾出版许多书籍，如《直隶工艺志初编》、《万国公法提要》、《农学新书》、《李文忠公事略》等；刘孟扬著的《天津拳匪变乱记》是由民兴报馆出版的。主编《竹园白话报》的丁国瑞，汇集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时评文章编为《竹园丛话》，先后出版了二十四集。有些书店如直隶书局、文明书局、有正书局等，也从事于出版工作，但规模不大，主要印些课本、碑帖以及《天津指南》之类的实用书籍。文美斋南纸局于1911年出版过一种《百花诗箋谱》，绘、刻、印均属上乘，清妍秀丽，色彩炫烂，享名一时。值得提出的是，1911年天津出版的《维新人物考》一书中，介绍了“马格斯”，这是迄今发现的天津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的文章。

民国以后，上海的一些著名出版单位如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大东书局等，陆续在天津设立了分支机构，并多集中在东北城角大胡同一带，以致后来在这里形成了半条文化街。上海、北

京等地的新书能及时在天津流通，这对促进天津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。

四

1919年在北京爆发了“五四”学生运动，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瞬息间席卷全国，并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。近代中国从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。

在“五四”运动之前，上海、北京出版的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等宣传新思潮的书刊，行销天津，已经在青年中间产生了深刻影响；“五四”运动爆发后，天津的进步青年纷纷建立革命小团体，同时出版鼓吹革命的报刊。影响最大的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出版的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双日刊，创刊于1919年7月，由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周恩来担任主编。该报坚持出版了一百多期，从舆论上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广泛、深入的展。这一时期，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，如南开救国团开《南开日刊》，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救国团的《醒》周刊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团的《醒世周刊》，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的《平民》半月刊，真社的《新生命》半月刊，新心学会的《导言》，又新学社的《又新周刊》，觉悟社的《觉悟》，以及《七天评论》、《北洋日刊》、《师范日刊》等。这些报刊的共同特点是，不仅反帝爱国的旗帜鲜明，而且积极传播新思潮、新学说，富有浓郁的战斗气氛，如直隶一中学生于方舟主编的《新生》杂志，被誉为“全带社会主义色彩”。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，在李大钊的帮助下，在天津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出版工人报纸《来报》，还把李大钊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的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印成单行本，在天津广为传播。

上述这些进步报刊在北洋军阀政权的扼杀下，未能坚持办下去，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。当这些进步报刊沉寂不久，1920年6

月马千里主编的《新民意报》又以战斗姿态出现。该报有一显著特色，就是以附页形式出版了十几种副刊，成为宣传新思潮、新文化的重要舆论阵地。主要的副刊如：《星火》、《向明》、《女星》、《觉邮》、《国光》、《朝霞》、《绿波》、《戏剧》、《青声》、《诗坛》和《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》等。《新民意报》在天津出版史上的另一大贡献，是发表并出版了周恩来撰写的《警厅拘留记》与《检厅日录》，为天津“五四”运动史留下了重要文献。

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，天津陆续有文艺期刊问世，如《春柳》、《新小说报》、《小说旬刊》、《中州文艺》、《启明》、《星夜》、《虹纹》、《晨风》、《绿竹》等，但大多昙花一现，存在时间不长。1924年大公报馆创办的综合性期刊《国闻周报》，以其内容丰富，论述持平，且网罗许多知名学者、作家撰稿，因此畅销全国，较有影响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停刊。

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旧有的封建文化，出版阵地为新文化所占领。一些蛰居天津的下野官吏与封建文人，以保存“国粹”为名，从事于古籍的校勘整理工作。比较热中于此道的如徐世昌、金鉞、王仁安、高凌雯、卢木斋、卢慎之等人。他们出资辑印的古籍既有刻本，也有铅印本，其中有不少具有传世的价值，如徐世昌编辑的《晚晴簃诗汇》、《明清八家文钞》、《大清畿辅先哲传》、《清儒学案》，卢木斋编辑的《慎始基斋丛书》、《湖北先正遗书》，金鉞刊印的《金氏家集》、《屏庐丛刻》、《天津文钞》、《天津诗人十二种》、《莲坡诗话》等。他们从事这一工作虽然各有想法，但在客观上对于保存古代文化遗产，还是有所贡献的。

五

进入三十年代以后，以上海为基地的我国出版事业达到全盛

时期，天津的出版事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。

首先是新闻事业的发达。除了《大公报》、《益世报》已成为行销全国的大报外，在二十年代后期又有《庸报》、《商报》两家影响较大的报纸出现。不同政治背景的小报风起云涌，前后多达三十余家。画报也有多种，办得较好的如《北洋画报》。

其次是各种期刊大量涌现。文艺刊物居多，先后问世的有《星星》半月刊、《一炉》半月刊、《北风》旬刊、《人生与文学》季刊、《北调》月刊、《海风》月刊、《天下篇》半月刊、《红绿》半月刊、《诗歌小品》月刊、《当代文学》月刊、《文地》月刊等。美术期刊有《天津漫画》、《绿藻》、《美术》，体育期刊有《体育周报》。政治综合性期刊，除原已出版的《国闻周报》而外，又有《暖流》半月刊、《新北方》月刊、《白河》周刊、《评论周报》、《现代社会》旬刊、《河北月刊》、《大道》半月刊、《牢骚》月刊等，其中《暖流》杂志被国民党当局以“诋毁中央、攻击本党”的罪名，勒令查禁。1935年“一二九”运动前后，进步青年办了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，如《民鸣》、《群众》、《合力》、《民众之路》、《唤起》等，出版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查禁。

在三十年代，各行各业包括机关、团体都积极创办杂志，例如：华北水利委员会的《华北水利》、《气象月报》，商品检验局的《检验月刊》、《天津棉鉴》月刊，河北省工程师协会办的《河北省工程师协会月刊》，海事编译局的《海事》月刊，芦盐区改良碱地委员会的《改良碱地》月刊，工务局的《工务》月刊，社会局的《社会》月刊，公安局的《公安》月刊，教育局的《教育公报》，河北省立第一博物院的《河北博物院馆刊》，国医研究会的《国医正言》月刊，国术馆的《国术》月刊，中国健康学会的《健康生活》月刊、《性科学》月刊，国货研究所的《国货研究月报》等等。经济刊物也有多种，如河北省实业厅的

《河北物价指数季刊》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《政治经济学报》、《南开指数年刊》，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的《经济汇刊》等。当时天津的高等院校，如北洋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法商学院、工商学院、河北工业学院、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、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，以及一些中学如河北省立中学、南开中学、扶轮中学、汇文中学、耀华中学、河北中学等，都办有校刊，有的还出版学报。当时办刊物风气之盛，连一些宗教团体也不落后，如基督教青年会的《天津青年》，天主教会的《北辰》，清真大寺教义研究室的《回民公报》，佛教组织的《佛教月报》等。

图书的出版也非常活跃。当时从事于出版工作的有三大系统：一是书店，二是报馆，三是高等院校。天津的出版事业由于一向缺乏强有力的投资，因此没有形成专业出版机构，到了三十年代出现数家经营出版业务的书店和出版社，如百城书局、南洋书店、精华印书馆、天津书局、华洋书庄、天津教育书社、天津沙漠社、北方文化流通社等。出版的书籍如《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与实践》（傅筑夫著，百城版）、《日本政治经济研究》（许兴凯著，百城版）、《中国近百年史》（孟世杰编，百城版）、《黑格尔理论大纲》（刘及辰译，百城版）、《当代苏俄戏剧》（润荪、大鸨译，南洋版）、《天津事变》（张拓著，天津书局版）、《英美金融概论》（韦锡九著，天津书局版）、《天津无名作家小说集》（沙漠社版）、《梨园外史》（潘镜芙、陈墨香著，百城版）等。此外，有的广告公司与印刷厂，也偶而印行一些消闲性读物。

报馆兼办出版的，主要是大公报馆和益世报馆。如大公报馆出版的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（王芸生著）、《苏俄视察记》（曹谷冰著）、《史大林谈话记》（艾秀峰译）、《中国的西北角》、《塞上行》（范长江著）、《赵望云农村写生集》等，益世报馆出版的《沽水旧闻》（戴愚齋著）、《天津典当业》（张中鉴著）、《新新外史》（濯缨著）等。其他报馆也有印书的，如

新天津报馆的《丙寅战史》（刘髯公著） 大中时报馆的《民国十二年国耻惨痛志》（遇春氏著）等。

高等院校出版的多属学术性著作，如南开大学出版的《天津之工业》、《天津棉花运销概况》、《论华北经济及其前途》、《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业雇工制度》（以上皆为方显庭著），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出版的《天津面粉工业状况》（董昌言编），法商学院出版的《天津之银号》（王子健、赵履谦著），北洋大学工学院出版的《算学引论》、《算学史要》、《现代科学的 世界 观》（皆邵光谟译）等。

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，进入三十年代以后，天津的出版事业出现趋于繁荣的征兆。然而，这种发展趋向，被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止和扼杀了。

三十年代，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处于地下状态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。党的地方组织，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活动，先后出版过报纸《好报》（1929年）、《实话报》（1934年），杂志《出路》（1928年）、《北方红旗》（1928年）、《天津文化》（1933年）、《天津妇女》（1936年）以及《火线》、《长城》、《真理》等。1929年初，经党中央决定，将原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秘密印刷厂迁来天津，地点在英租界广东道（今唐山道），对外名称华新印刷公司，并派毛泽民来津主持其事。这个印刷厂除负责印刷党的文件外，主要任务是排印秘密发行的党内刊物，如《向导》、《中国青年》、《红旗》等，还翻印过革命理论书籍如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“左派”幼稚病》、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》、《共产主义ABC》等。党中央的这个秘密印刷厂在天津工作了将近三年时间，又奉命迁移。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，还先后开办了两个书店：一个是北方书店（1930年，地点在法租界二九四号路，即今劝业商场北侧）；一个是知识书店（1936年，地点在法租界二十一 号

路，即今国民饭店楼下）。两个书店存在的时间虽然都不长，但在传播革命书刊方面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上述党在天津所进行的出版活动，向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大群众播撒下革命的火种，唤起人们积极投入革命斗争。

六

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芦沟桥制造事端，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同年7月30日，日军攻陷天津，从此天津人民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占领之下，历尽苦难和屈辱，时间长达八年之久。

日本侵略者在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，不遗余力地摧残天津的文化教育事业。日军占领天津后，报刊首当其冲，凡具有抗日爱国色彩的报纸，包括《大公报》、《益世报》、《商报》在内，都先后被迫停刊；《庸报》在抗战前就已被日本特务机关收买，这时一变而为日本侵略军的机关报；有些小报屈服于日军的压力，改弦更张，无耻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，但为时不久也逐渐被淘汰掉。日本侵略者多行不义，惧怕舆论，最后仅允许少数几家直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的汉奸报纸存在。抗战前出版的各种期刊，基本上也都停办了，经批准允许存在的少数期刊如《每月科学》、《商钟》半月刊等，都是非政治性的。

公开出版的报刊在敌人的压迫下被迫停办，而爱国抗日的地下小报却纷纷涌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抗战初期的二三年间，先后出版了三十多种，有油印的，也有铅印的。其中，有共产党办的，有国民党办的，还有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办的，以及无党派背景的爱国学生、工人、知识分子办的。影响比较大的如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《新闻报》（后改名《时代周刊》）、《解放》周刊、《中山》旬刊，共产党组织办的《抗日小报》、《风雨同舟》、《华北战旗》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地方队部办的《灯塔》，国民党员办的《实录》、《长城》、《吼声》